

## 特稿 64



李雪3岁时,一家四口照了全家唯一的一张合照。父亲去世后,这张照片更显珍贵。 本报记者 王伟伟摄

## 寻找“李雪”22年

■本报记者 周有强 朱林

“李雪”这个名字,对北京东城区永定门外的李雪来说,是一个沉重的记忆。

22年前,因为父母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用作超生二孩的罚款,李雪上不了户口,直到现在。

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,像她这样没有户口的人在全国至少有1300万,这意味着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没户口。她们没有户籍资料,没有户口卡,也没有身份证,被社会俗称为“黑户”。其中,780万和李雪一样,属于超生人员。

在李雪“黑户”的22年间,崇文区合并到了东城区,全国人口普查进行了两次,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,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从独生子女,到单独二孩,再到全面放开二孩的转变,李雪家门前铁轨上奔驰的绿皮火车也换成了银白高铁,时速从平均70公里提升到了300公里以上。

然而,李雪的生活却一直是停止的。因为没有户口,她没上过一天学,没坐过火车,没出过北京城,不能参加保险,无法就医,甚至将来很难找到工作,无法结婚生子。

“什么权利都没有。我有时候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。”坐在永定门外自家平房的一张椅子上,李雪从抽屉里翻出四个褐色的档案袋,抽出厚厚的—摞纸片儿,用手摊开来,这些来自不同单位、不同部门的纸片儿铺满了整张木桌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为了给李雪上户口,白秀玲和丈夫李鸿玉上访19年,诉讼16年,得到的结果就是桌上这堆纸片儿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来越严重,经常在早晨痉挛。

2014年4月28日,李鸿玉以李雪为原告,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又一次起诉永外派出所。

那天早晨从家里出来时,李鸿玉只是走了几步路,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再加上先天性肌肉强直,他已经明显感觉到“身体不听使唤了。”可是,白秀玲得了脑血栓和高血压,每天得吃好几种药,腿脚也不便。最后,李鸿玉坚持和李雪一起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。

等他们坐地铁回到家里时,李鸿玉的身体就再也扛不住了。在住进医院的第二个星期,他开始呼吸不畅。两个多月后,2014年9月5日,李鸿玉呼吸衰竭。医院抢救过来后,李鸿玉成为植物人。

李雪知道父亲心里放不下什么,她会不时坐在床边,和父亲念叨诉状,官司的事情。有一回,李雪说着说着,悲从中来,不伏伏在床头哭了起来。“爸,你要赶快醒过来,你还要跟我去法院。”

当她抬起头来,准备擦拭眼睛时,李雪看到,父亲的眼角已满是泪水。

2014年11月6日,李鸿玉去世。在为女儿的户口上访19年,诉讼16年后,一个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为女儿找到户口。

“小雪,永远不要放弃。”李鸿玉再也不会抚摸着李雪的头,对她说出这句话了。

姐姐出嫁,父亲去世,妈妈也越来越走不动路了。可李雪还得继续寻找“自己”。

“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的户口”,现在,她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自学法律,阅读法律条文,写诉状,跑法院和检察院。《户口登记条例》、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、《社会抚养费管理征收条例》等涉及户口和计生的法律规定,她一条一条看,一条一条记。

在李雪开始独自寻找“户口”的这几年,中国延续多年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规模的减少,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严重等因素,已经实施了30多年的“独生子女政策”也在不断松动。

2013年11月,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“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。”

在此背景下,自2013年底至今,宁夏、山东、江西南昌、湖北、广东等地陆续公开发文,重申计生与户籍脱钩,严禁为户籍登记设立任何前置程序。

2014年7月10日,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例行发布会上也称:将落户、入学、低保与父母落实计划生育情况挂钩,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符,应当坚决禁止。

与此同时,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奖、惩、扶助等配套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之中。2014年,针对“失独群体”,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规定,独生子女三级以上残疾或死亡,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,且女方年满49周岁的夫妻的特别扶助金的标准分别提高:城镇每人每月270元,340元,农村每人每月150元,170元。

而李雪的官司仍在继续。2014年4月28日,她对永外派出所提起的诉讼,不被受理。上诉,被驳回。申诉,被驳回。2015年7月7日,她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提起抗诉。

“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,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。”就在上周,2015年10月29日,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宣告,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时,李雪正在等待检察院是否提起抗诉的结果。

“我的‘黑户’问题,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?”在经历漫长的失望与等待后,李雪对重燃希望已经越来越谨慎。

现在,李雪常常回忆起家里的土坯房还未倒塌,姐姐还未出嫁,爸爸还未去世时候的光景。

那时,在那个“墙壁满是裂纹,屋顶开始下沉,动不动就住下掉土,随时都有可能塌掉”的土坯房里,一家人还在一起,自己和姐姐帮着妈妈做饭,爸爸坐在门前抽烟。“简简单单的。”唯有家人的陪伴和亲情的温馨,才能让这个从懂事以来就为户口而忧心的姑娘,忘记片刻自己没有户口这件事。

寻到那个存在于身份证卡片上的“李雪”,李雪还需要多久?

“这是医院给我开的医学出生证明。”李雪从这堆纸片儿中抽出一张,用手指着说。

因为家里困难,白秀玲和丈夫并不想要这个孩子,“李雪的到来是个意外。”

可是,当白秀玲发现怀上李雪时,已经两个多月。当时因为削土豆,刀掉到白秀玲大腿上,扎了一个大口子,伤口迟迟不能愈合。医生告诉她,这样不能流产,会有生命危险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。



母亲越来越走不动路,22岁的李雪,开始踏上独自找回“李雪”的路。 本报记者 王伟伟摄

李雪出生的第5天,父亲李鸿玉拿着出生证明到永外派出所上户口,被拒绝了。“你们超生了,回家等着吧。”4个月后,街道计生办主任来到他家,放下一纸“处罚决定书”,对夫妇俩征收超计划生育二孩的社会抚育费5000元。

李鸿玉当时是北京皮毛三厂的工人,一直停岗在家,一个月收入不到150元。白秀玲的被开除,将这个家庭迅速推入贫困的境地。可是,他们被告知,不缴纳这5000元,计生部门就不给开证明,连带着孩子就上不了户口。

要给孩子上户口,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吗?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二条明确规定: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;第七条规定: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,由户主、亲属、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。也就是说,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,无附加条件。

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,1988年,公安部、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联合下文,禁止将计生证明、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。

但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,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捆绑的“土政策”。“上户口虽然不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,但不挂钩,如何约束超生呢?”山东省一

位不愿具名的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这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之举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,2014年,全国至少有20个省(市、自治区)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,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,其中北京、上海、辽宁、四川、河南、湖北等6个省市在省级户籍制度上明文规定,将计生与户籍挂钩。

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于2014年完成的“黑户”调查报告也显示,由于多年来“新生儿落户”与“超生罚款”捆绑成为通行的政策,大量家庭没有及时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“这在客观上带来780万新生儿没有户口,并成为‘黑户’产生的源头。”

“我超生犯错,可是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呢?”白秀玲无法理解这个逻辑。更何况5000元对于当时这个穷困家庭而言,是3年不吃不喝的总和,“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?”

“她连疫苗都没打过。”回忆起往事,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。按照国家规定,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,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,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,更不用说户口住址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1995年,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。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,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:开除白秀玲,单位处理正确,不能改变;至于户口问题,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,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。

这条模糊信息,一度让夫妇俩以为户口有望了。可是,在写了检查,寄了给区长的信后,满怀希望的他们,等来的却是“无人搭理”。

1998年,李雪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。李鸿玉央求侯居居委会给李家附近的桃杨路三条小学写了一封信,请求照顾李雪入学。

可当李鸿玉拿着居委会开具的信、户口本和两本残疾证带着李雪去报名时,校方却坚决拒绝。第二年,学校还是不让李雪入学。

两次拒绝,让李雪从此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。进不去学校,李雪开始自学。已经上了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,学会了,她就自己看着字典学。然而,受到家庭的影响,姐姐初三毕业便辍学就业补贴家用。李雪的教育也仅维持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。

有一回跟着妈妈去买菜,李雪看到学生放学,在街上就哭了起来,“妈,我想上学。为什么我不能上学?”看着眼泪汪汪的女儿,白秀玲只能强忍泪水,“孩子,你没户口,上不了学。”

上不了学的李雪,只能每天呆在家里,“没有朋友,也没有童年,相当于跟社会脱轨了似的”。姐姐李彬觉得,妹妹小时候很胆小,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,不敢跟人说话。“她也不喜欢照相,因为户口的事儿,有些自卑。”

这样的自卑,在万海远的“黑户”调查也得到印证。他发现,“黑户”在心理上没有认同感和存在感,心理健康程度普遍较低。“经常觉得郁闷和忧郁的比例超过34.6%和15.7%。”

在日常生活中,李雪处处感受到没有户口带来的不便和限制。尤其是随着户籍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捆绑,身份实名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,这种感觉愈发强烈。

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,都与这个叫“李雪”的人无关。没去过博物馆,没住过旅店,没有银行卡,没收过汇款,现在连快递都寄送不了,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,都被售货员拒绝。李雪用爸爸的身份证办手机号码,用妈妈的医疗本看病,用姐姐的图书证借书。只要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,她都没办法独立办到。

从李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.8公里,可是22年来,她从没出过北京。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。

她没谈过恋爱,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。“结婚证都领不了。”一说起来,李雪就眉头紧皱。

更让李雪感到无奈的是,有一回她独自去法院递交材料,法院却让她出示身份证,否则就不让进,“可是我是原告,就是来诉讼户口的啊!”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

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来,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,整个人向左倾歪。